

张春梅 / 著

中国后现代语境下的
文学叙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HOUXIANDAI

YUJINGXIA

DE

Wenxue Xushi

☆本书获得新疆大学211工程项目和新疆大学博士启动基金资助

中国后现代语境下的 文学叙事

张春梅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HOUXIANDAI YUJINGXIA D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叙事/张春梅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207 - 08688 - 4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 IV. 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7523 号

责任编辑:李 珊

封面设计:世 真

中国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叙事

Zhongguo Houxiandai Yujing Xia De Wenxue Xushi

张春梅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哈尔滨金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688 - 4/I · 1141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序

张春梅是我在 2004 年招收的博士生之一,是一位乐观开朗又勤于学、敏于思的女生。在读博期间,按照专业方向的要求,她读了不少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也细读了 1990 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在开题阶段,经过反复的讨论,最后定下了《中国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叙事》这个题目,可以说充分调动了她的阅读优势和学养积累。

关于后现代理论和后现代文学,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自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紧随其后,也有不少论述。但把后现代理论与文学创作密切地结合起来,而且重点研究中国本土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叙事,尚无系统的著述。张春梅对这个具有中国特色课题的研究,显然是更具系统性和前沿性的,有自己的对象、视角、方法和立场。本书力求在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后现代语境的生成,以中国 1990 年代以来的文学叙事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语境和生成二者逻辑关系的始终贯彻,把握中国文学叙事中出现的后现代观念以及相应的叙事策略。

后现代的文学叙事在中国出现主要是 1990 年代以来的事,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一系列文学事件,且形成了与过去不同的文学观念、价值观念和文学实践,这既是一种事实,又是概念和边界相当模糊的事实,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充满了争议。与此同时,它的出现与中国本土的语境究竟有着怎样一种生成的关系?是完全受了西方后现代观念和后现代文学的影响,还是在中国本土已经出现了后现代的语

境？若有，这种语境是如何生成的？在此语境中发生的文学叙事有着怎样一种后现代的观念和叙事策略？它处在何种文化悖论之中？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本书并不回避这些尖锐复杂的问题，而是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牢牢地抓住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并且把这些问题作为该书结构的纲目，一一予以回答。尽管西方对后现代和后现代文学的研究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有着许多权威的理论表述和丰富的文学资源，但毕竟不能替代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本书虽然吸取了西方人的研究成果，但完全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对中国 1990 年代以来的社会语境、文化语境和文学语境作了较详尽和有特色的考量，对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如何在此语境下生成和发展作了动态的研究，对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与西方不尽相同的观念和特点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发掘、提取和阐释。根据作者的研究，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不同于西方后现代文学，它是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中游走的一种写作姿态、方式和策略，这个颇为中肯的见解贯穿于全书。本书对中国的后现代文学叙事采取了一种相当辩证的认识方式和评价体系，在肯定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同时，还充分地指出了它内在的、尖锐的文化矛盾和美学、伦理学上的严重缺陷，对它的文化批判是严厉的，同时也是具有说服力的。

张春梅目前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在撰写博士后的出站论文。她的生活是充实的，工作也是忙碌的。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既向她表示祝贺，也怀着新的期待，祝愿她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新的成果。

王纪人

2009 年 5 月 1 日于上海登云公寓

目 录

学术史述评	(1)
一 后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	(1)
二 后现代批评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4)
三 走出理论与语境的纠葛	(11)
导 论 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叙事问题	(16)
一 “中国后现代”:一个争议不休的难题	(17)
二 从文化叙事到文学叙事	(34)
第一章 中国后现代语境的生成	(41)
第一节 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的社会语境	(41)
一 后现代的全球图景	(42)
二 自体生发的后现代性	(49)
第二节 后现代理论的引入与生成	(59)
一 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引入	(60)
二 后现代之争与“中国问题”	(63)
第三节 变动中的文学语境	(73)
一 文学场的动荡与转型	(75)

二	观念纵横的年代	(85)
小 结	体验与观念并行	(93)
第二章	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景观	(96)
第一节	后现代文学观念的建立	(96)
一	美丑倒置原则	(98)
二	从“自由之我”到“叙事之我”	(102)
三	像游戏一样写作	(106)
四	重估一切价值	(109)
第二节	后现代叙事策略的运用	(114)
一	互文:整体幻象的破碎	(116)
二	元叙事:寻找传统的裂缝	(124)
三	反讽:无所依傍的自我	(129)
四	重复:话语增殖与真相消隐	(131)
五	影像:大众文化的叙事法则	(133)
第三节	交叉跑动:中国后现代叙事的身份危机	(139)
一	潘军:在先锋与媚俗之间	(141)
二	李冯:从独语到合奏	(144)
三	徐坤:自我消解的狂欢	(147)
小 结	暧昧与游移的叙事	(152)
第三章	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的文化矛盾	(156)
第一节	无法躲避的崇高:日常生活的诗学困境	(157)
一	日常生活的叙事逻辑	(158)
二	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从群众到个人再到大众的身份 演变	(162)

三 无法躲避的崇高	(166)
第二节 反叛与回归：“代”的时间焦虑	(171)
一 你为谁辩护：从断裂问卷谈起	(172)
二 “代”的生存法则	(177)
三 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的身份诉求	(184)
第三节 对抗与和解：余华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	(192)
一 先锋的叙事逻辑	(194)
二 不变的先锋	(199)
三 谁在先锋的视野中	(203)
第四节 不可倚靠的语言：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的美学危机	(206)
一 无望的语言	(208)
二 叙述中的语言	(215)
三 时代语境中的语言表达	(220)
第五节 “叙事中的肉体激进主义”：身体的指示功能	(228)
一 叙事中的身体	(229)
二 为美人塑形	(234)
三 双重视阈：先锋性与大众性	(241)
四 身体的后现代缺陷	(245)
小 结 徘徊于先锋与大众之间	(249)
第四章 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的历史境遇	(251)
第一节 历史张力的消失	(253)
一 当“纯文学”已成往事	(254)
二 你对谁反叛？	(259)

三 “狡兔三窟”的窘境	(262)
第二节 无法把握的当下	(268)
一 “私人化”:一个可疑的承诺	(269)
二 “另类”:不可承受之轻	(273)
三 循环:二元对立之再生	(278)
小 结 我们还需要文学吗?	(283)
余 论 一切仍在进行	(286)
参考文献	(292)
后 记	(305)

学术史述评

尽管如何认识中国的后现代理论话语在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但一个不容否定的现实是:有关后现代的理论探讨和后现代叙事实践层出不穷。无论是立足于文学叙事的后现代理论批评,还是从文学文本研究转向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研究,或者将视角定位于权力、东方形象和身份的后殖民研究,都与后现代理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从客观上要求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而应该把中国的后现代理论话语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对象来进行具体的考察。其中,后现代批评与后现代文学叙事的关系是最核心的问题,牵扯到的议题也最多。所以,本书拟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深入文本,深入到文学所处的社会语境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去考察事情的发展状况、问题出现的原因,并从中探寻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的特点,努力找到后现代语境中文学所需要的发展质素。

一 后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

这里所谓的“中国后现代文学批评”,并非是指某种带有鲜明后现代特征的批评模式,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必然是在对后现代问题的关注下展开,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有后现代观念在场的批评。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的接受是经过翻译、编辑和创造性的理解等阶段的,但对文学作品的后现代解读从后现代话语进入中国就始终是研究者们进行文学解读的一种常见方式。这种方式应该是行之有效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文学批评与后现代连在一起。出现这种

状况,既与中国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相关,更是当代文学现状所决定的。^① 在中国后现代批评话语中,对后现代文学叙事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走向。本书力图在对以往研究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呈现出其特点所在以及有问题和待斟酌之处。

首先,中国的后现代文学批评是与先锋派的文学创作分不开的。

先锋派之兴起与后现代理论在中国学界的广泛传播几乎在同一时间,大致在1980年代中后期。1980年代正是一个门户大开、放眼看世界的时代。学界涌起了轰轰烈烈的“理论热”和“方法热”的大潮,许多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西学都在短时间内进入中国人的视听。这种理论的成批量引进,无论从文化接受史还是交流史看都蔚为大观。众多新理论和新方法既给当时的理论现状带来巨大冲击,也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为之提供了看待世界和反观自身的新的角度。同时,这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文学创作都很难再依照原来的路子继续下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模式再也不能满足经历了浩荡岁月的文学爱好者和广大读者。关于“意识流问题的通信”(王蒙发起并进行了写作实践)就是这种现实要求的一个信号。在受到心灵、精神与价值观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人们曾持有的坚定信仰遭遇了怀疑之蛇的吞噬。出生于1960年代的年轻人或适逢此次运动,或赶上了它的尾声。但无论如何,其影响都是深远的。这从此后不断涌现的“文革”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即可见一斑。先锋派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探索。在先锋派的作品里,文学批评者很快就发现一些新的叙事方式与对写作的新的理解。其中不难看出对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创作模仿和借鉴的痕迹,这就使原本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实验有了亲密接触的机会。马原、孙甘露、残雪、王小波等可谓此种叙事方式的先驱式人物。可以说,对先锋派创作的批评是后现代理

① 作者注:对此问题本书将在第一章详加分析。

论在中国具体运用的开始并至今不衰。陈晓明、王宁等批评家堪称其中的先锋性代表。

其次,除了对先锋派的创作进行后现代批评外,学界对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生代的文学创作进行后现代的解读是中国后现代批评话语中另一重要部分。

先锋派的“先锋性”在1980年代末走向衰退,这既与1980年代后期来自港台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对中国大地的巨大影响有关,也和中国政治经济在20世纪末的转型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其自身。先锋派创作耽于形式、沉迷于话语游戏和对传统文学的颠覆与解构,这样创作出的连文学工作者尚且读来难度重重的作品,又怎么可能得到广大阅读水平和欣赏水平参差不齐的读者的厚爱呢?读者的流失以及社会体制对先锋派的收容最终使得中国的先锋派走上了先锋的老路;英勇的创立者理应完成的不同凡响的预言式决裂举动,却努力地为消解开始阶段的英雄和英雄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①

不容忽视,尽管先锋派的创作开始了转轨,但后现代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却越来越广泛。对新写实、痞子文学、新生代以及美女作家、网络文学、1980年代生作家的作品充斥着后现代的文学批评,其中又以新写实和新生代的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新写实的创作当中有一些因素与后现代主义有关。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风格、一种思维方式,比如说在新写实作品中写作对象的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态度,对父辈形象的颠覆,对传统和历史的解构,边缘人群的“个性化”生活方式以及对琐碎生活的无奈书写。这种人物的生存状态与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蔓延的颓废情绪和价值观的游移有一致之处,也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心的解构有互证的地方。

①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正是这些反映在新写实和痞子文学中人物身上的特征和生活态度，使批评者看到了对之进行后现代批评的可行性。而王朔其人其文很自然地成了分析的主要对象。

与新写实和痞子文学相比，新生代的文学创作似乎与后现代有更多相通之处。一方面，新生代所处的时代和语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先锋派、新写实和痞子文学的写作者还烙着历史沉痛的痕迹因而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幻灭感的话，那么，新生代的创作则更多地融入了消费文化的质素。当前者还因为历史和时代发着嘟嘟囔囔的牢骚，尽管那已是无结果的絮叨，后者则在尽情享受城市的堕落和销魂，“享受人生”、“游戏人生”，过程与激情比之长久与安定对他们来说要有魅力得多。新生代创作与都市文化、消费文化的互为观照，加上19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流动和中国城市的巨大发展就使他们与后现代主义有了更多的一致。后现代主义与城市、与大众文化的亲密关联，使对新生代的文学批评找到了行之有效的解读话语。因此，拿起对新生代作品的批评，我们总是可以发现“后现代”的字眼，或是与后现代有关的言论与思想。

二 后现代批评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从可见的中国后现代文学批评看，主要集中于以上所提到的几个对象：先锋派创作、新写实、痞子文学、新生代写作等。在这些作品中所发现的后现代叙事方式或人物展现的后现代风格使后现代理论成为有效的解读方式之一。但是，在后现代批评话语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和如何看待后现代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是缠绕在一起的。由于后一问题的众说纷纭，中国的后现代文学批评也呈现出多种状况。有一点需要说明，对中国现实进行社会学分析和文化研究与对作品进行后现代的文学批评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文学无疑是有其特殊性的，要分析一部作品，我们必须要与文字和语言

见面,与相对稳定的结构^①见面。而且,文学作品由人写成,主体性的存在也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纸内与纸外分开,这就需要我们以不同的视角来分析文学作品。当运用后现代理论分析文学文本时,既要将文本本身的特征作为内部研究对象,也要将文本与外部社会的关系考虑在里面。而在对其中一方进行后现代的分析时,又要考虑到所运用的后现代理论的可操作性。基于这些思考,本文接下来将对一些典型的后现代文学批评文本作出分析,以期把握后现代文学批评的现状。

首先,在如何把握先锋派与后现代的关系上表现为以下几点:二者关系模糊、将前者视为后者的中国证明、将先锋派视做后现代派文学的典型文本、评述面面俱到导致批评的中心被取消。

陈晓明是对先锋派文学进行后现代解读的代表。他不仅对先锋派的文本进行了细致的文本研究,而且对先锋派的创作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并联系变化中的中国现实将先锋派的文学创作语境化。然而陈晓明的后现代文学观是多元化的。陈晓明赞成美国学者莱斯利·费德勒“越过界限,填平鸿沟”的说法,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打破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纯文学和俗文学之间的界限。这被作为判定一部作品是否是后现代的标准之一。因此,他曾明确地说:当今的大众文化完全是自发的生长,其本质的虚假性,其实践方式的倒错性,被置放在当代文明的历史情境中而显示了它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它在历史的大文本中被制作成后现代文化的样品,借“历史之手”完成其后现代性定位——它是历史叙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文本。^②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认为正因先锋文学背离大众文化而表现出的精英性使中国的先锋派文学成为一个“奇怪的

① 作者注:这里之所以说是相对稳定的结构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作品一经完成并以独立的文本形式面世,它就已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对作品的解构和重写又使作品在内涵上具有不稳定性,从而使我们所面对的作品只是无数文本中的一个。

② 陈晓明:《中国的双重语境》,载《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

现象”。这是站在社会语境的角度来看待文学文本的。

问题也许就出在这里,我们评判一部作品是否是后现代的,是以作品本身所呈现的后现代文学的特征为主,还是以社会语境和社会发展为主要参考标准?按理说二者是不应偏废的,但假如一部作品根本不具有后现代风格和写作上的特征而只是在大众文化发达的1990年代后期写成,我们是否可以凭此确定其为“后现代主义文本”呢?这是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之一。

同时,在一些批评中,我们处处可见后现代话语,却又让读者不能确定到底该不该指称所提到的作品是后现代的。如陈晓明在《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一书中谈到先锋派时,先介绍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特征,如:“边缘精神”萎缩成一种观念、加强了艺术与生活的“原则同格”、追求艺术的日常化和平面化、生活与艺术偶然而奇妙地组合或渗透在一起等等,接着指出“先锋派大多数人都有迅速适应市场的本领和算计版税的智慧”^①。这些对后现代和当代艺术创作现状的分析无疑说明了后现代艺术在中国的现实存在。然而,在进入作品的具体分析时,我们原先的认识又开始了漂移,如:“马原现象”确实足以证明后现代主义已经诡秘地来到了中国文坛。……当然,仅就这样的意义还不足以成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首先是社会高度商品化的产物。^②看到这里,我们想弄清楚,这种批评究竟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来谈文学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还是以文学本身为基点来谈后现代的文学创作,或者是商业发展加上马原式的“后现代主义”就“足以成为后现代主义”?以上种种,都使类似的后现代批评显得模棱两可。

其次,后现代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的绝对化。前面曾提到费德勒

① 参见陈晓明:《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② 陈晓明:《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有关文化之间界限消除的认识,这看法本身并不一定符合西方后现代派文学创作的实情。我们可以说一部作品具有后现代性(许多批评就是这样作的),但未必就能以此说明后现代写作是非精英的写作。约翰·巴思指出:理想的后现代派小说应该超越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形式主义和“内容主义”、纯文学和有使命的文学、通俗小说和杂牌货之间的争吵。^①“超越”二字,将“跨越界限、填平鸿沟”的取消性提高到了创新的层次。就此而言,赵毅衡对后现代派小说的理解应该说是符合其产生和创作的意义的:“现代通俗文艺、商业文艺有极强的消化力,现代派的成果被庸俗化、体制化,所以后现代主义才不得不诉诸不断变异,不断更新,无法为俗文化消化的形式。后现代派文学正是靠了这种文化立场,才恢复了‘现代派的初期状况’,即恢复现代派被磨钝了的评判锋芒。它试图在消费文化的狂潮中坚持文化价值。”^②这种理解是与后现代派小说和现代派小说的关系相符合的,也和许多西方后现代理论家如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初级阶段、丹尼尔·贝尔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高峰等观点基本一致。后现代主义的反中心主义、反整体化、反对压制、弘扬差异等主张都体现出强烈的先锋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社会语境具有后现代特征,当代文学叙事在某个层面上具有后现代性,但这并不能推论这样的小说就是后现代派或后现代主义的。当与后现代小说的创作相联系,结合文学所处的复杂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来对文学叙事作出考察时,不同语境中生发的文学叙事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质。

从这个角度看“后新时期”的提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需指出,凡“后”的并不一定具有与“后现代”同样的意义,中国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发展也并不代表文学叙事就是大众文化的,这些都只是写

① 【美】约翰·巴思:《后现代派小说》,转自何望贤主编:《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42页。

② 赵毅衡:《后现代派小说的判别标准》,载《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作的背景罢了,具体作品还需具体分析。这样看来,陈晓明下面的言论就显得太过绝对:我们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以及“纯文学”的追寻者,发现自己处在绝路上:背后是“后现代主义”,前面是商业主义,这条中间道路当然无力挽救文学失败的命运。^① 这里的前后之分与他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与商业的高速发展之间的矛盾自不待言,但是“这前面只有‘后现代主义’”一说就太过绝对和欠考虑,且文学的失败与成功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

与之相似,王岳川——颇有影响的中国后现代理论研究者——一方面大声疾呼要“走出后现代思潮”,一方面又对中国后现代文化批评大加肯定。^② 这两个举动正可谓南辕北辙,走向了一条线的两端。1990年代后期王岳川的后现代研究转向了后殖民主义,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批评文章将视角定格于后殖民笼罩下的中国当代文化现象,无疑与其前期后现代思潮论一样保持着用理论概括现实的特点。

第三,忽视了不同对象在写作的时代语境、写作态度、作家身份、读者趣味等各方面的差异。其中,用同一理论涵盖先锋派与新生代创作的现象较为典型。新生代的作品与先锋派的创作是大为不同的,无论从创作的态度、作品对形式的追求、语言的刻意求新等方面,还是从其作品与读者大众的关系来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然,这群作家的复杂性与多元化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作家在创作上的不同,对新生代的作品很难用“都”这样的字眼来概括。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共同性,比如写作的态度:游戏式的写作,拒绝深度。如夏商坦言:“小说首先是好玩,如果我的小说浅薄,但是好读,并且有很多人在读我的小说,我觉得这就不错。”^③这可代

① 陈晓明:《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② 参见王岳川主编:《中国后现代话语》,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及其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人文杂志》、《文史研究》等刊物的系列文章。

③ 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